

中外历史学术丛书

中国现代文化论争

The Cultural Contestation
of Modern China



焦润明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中外历史学术丛书

中国现代文化论争

The Cultural Contestation of Modern China

焦润明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现代文化论争/焦润明著.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2. 4

(中外历史学术丛书)

ISBN 978-7-5097-2971-7

I. ①中… II. ①焦… III. ①现代文化-研究-中国 IV. ①G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62369 号

· 中外历史学术丛书 · 中国现代文化论争

著 者 / 焦润明

出 版 人 / 谢寿光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责任部门 / 近代史编辑室 (010) 59367256

电子信箱 / jxd@ssap.cn

项目统筹 / 徐思彦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 59367081 59367089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责任编辑 / 徐碧姝 赵 薇 李建军

责任校对 / 仪莉霞 刘伟雷

责任印制 / 岳 阳

印 装 / 三河市文通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16

版 次 / 2012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097-2971-7

定 价 / 118.00 元

印 张 / 39.25

字 数 / 682 千字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辽宁大学“211工程”三期建设项目标志性成果

- 金代商业经济研究/ 王德朋 著
- 清朝三百年史/ 张杰 著
- 中国现代文化论争/ 焦润明 著
- 美国经济史（17-19世纪）/ 韩毅等 著
- 美国文官群体研究/ 石庆环 著

|中|外|历|史|学|术|丛|书|

出版说明

《中外历史学术丛书》是辽宁大学“211工程”三期重点建设项目“世界文明进程与中国历史变迁”的标志性研究成果。

辽宁大学“211工程”三期建设项目于2009年6月正式启动。辽宁大学历史学院承担了“世界文明进程与中国历史变迁”重点项目的建设任务。根据辽宁大学“211工程”三期项目建设的总体部署，历史学院“211工程”三期建设项目领导小组和院学术委员会从全院教师申报的19部著作中择优遴选出5部，作为项目的标志性研究成果，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以丛书的形式统一出版，并冠名为《中外历史学术丛书》。

本丛书包括以下5部著作：《金代商业经济研究》（王德朋）、《清朝三百年史》（张杰）、《中国现代文化论争》（焦润明）、《美国经济史（17~19世纪）》（韩毅等）、《美国文官群体研究》（石庆环）。

这5部著作虽然没有统一的研究主题，在内容上也彼此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但涵盖了古今中外的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诸多领域，体现了“211工程”重点建设目标志性成果的广泛性、多元性和代表性。更为重要的是，丛书的每部著作都是作者在特定领域潜心研究多年、厚积而薄发的精心之作。相信这套丛书能真正成为“世界文明进程与中国历史变迁”重点建设项目研究成果和学术水平的标志，成为中国史学研究百花园中的一朵奇葩。

辽宁大学历史学院“211工程”三期建设项目领导小组

2011年6月

目 录

CONTENTS

导 论 “欧化时代”与文化论争	1
第一章 白话文与文言文的论争	20
第一节 文言文与白话文论争的时代背景	20
第二节 崇白话废文言的主张	36
第三节 崇文言抑白话的主张	51
第四节 围绕着“文言存废”的论辩	58
第五节 白话文的改进与应用	90
第六节 20 世纪 30 年代文言论争的再起	112
第二章 新文学与旧文学的论争	134
第一节 文学革命的背景缘起	135
第二节 文学革命的理论建构	150
第三节 旧文学的坚守及其对新文学的驳诘	171
第三章 尊孔与反孔的论争	190
第一节 民国初年的尊孔运动及其主张	191
第二节 反孔思潮勃兴及其主要观点	199
第三节 尊孔思潮的主要观点	216
第四节 反孔与尊孔论争及对其的评价	225
第四章 关于基督教存废的论争	239
第一节 非基督教同盟运动及其论争	240

第二节 关于中国是否需要基督教的论争·····	271
第三节 关于基督教是否为“帝国主义侵略工具”的论争·····	294
第四节 “以美育代宗教”的论争·····	302
第五节 “以科学代宗教”的论争·····	311
第五章 东西文化论争·····	331
第一节 东方文化派的主要观点·····	331
第二节 西方文化派的主要观点·····	371
第三节 东西两派代表人物的文化观论辩·····	386
第六章 科学与玄学的论争·····	402
第一节 科学与玄学论争的起因·····	402
第二节 玄学派的主要观点·····	412
第三节 科学派的主要观点·····	423
第四节 科学与人生观论争的结果及影响·····	432
第七章 “全盘西化”与“中国本位文化”的论争·····	445
第一节 围绕“全盘西化”的论争·····	446
第二节 围绕“中国本位文化”的论争·····	474
第三节 各方对于中国文化建设的不同指向·····	499
第八章 中西医论争·····	521
第一节 废止中医的言论及其论争·····	522
第二节 围绕着中医作为传统文化生存权的论争·····	557
第三节 关于中医科学化的论争·····	578
第四节 建立国际化的中国新医学·····	597
主要参考文献·····	611
后 记·····	619

导 论

“欧化时代”与文化论争

—

1915~1949 年为现代文化史时期。^① 1915 年作为中国现代文化史的起始之年，有如下理由：第一，高举民主与科学大旗的《新青年》（创刊时名为《青年杂志》），在这一年创刊。第二，也是在这一年，中国科学社正式成立，并由留美学生创办了专门宣传“科学”的《科学》杂志。《新青年》一直是现代知识分子宣传民主科学，主张向西方学习，从根本上改造中国的传统文化的舆论阵地。而《科学》则是由中国人创办的第一份专门介绍科学事物的自然科学专刊，在它的周围聚集了一大批有留学背景的、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学人，以介绍“整个的科学思想”为己任，强调科学救国，希望中国的社会发展，也要“受科学之赐”。第三，在 1915 年还出现了另一个极具象征性的标志，即《东方杂志》第 12 卷第 7 号发表了署名“造五”的《科学之价值》一文，系统地论述了科学的概念及价值，公开提出“科

① 笔者在拙著《中国近代文化史》中，把近代文化史的下限确定为 1928 年，以东北易帜为标志，提出的理由是：“1928 年张学良‘东北易帜’民国政府实现了国家的统一，并按照执政党国民党的意志，进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文化整合，并有能力建立自己的文化范模，从而开辟出一个新的文化时代。中国文化进入现代阶段。”（参见《导论：中国近代文化的流变》2006 年修订版）这一观点尽管有一些道理，但很难为学术界普遍接受，而其本身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所以借此修正笔者的观点，即认为 1915 年为中国近代文化史的下限，同时为中国现代文化史的开端。现代文化史的下限为 1949 年。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中国现代文化仍然传承延续，但是，执政的共产党通过国家政权运作的形式，重建自己的文化价值观，并将其纳入正统地位，从而结束了现代文化的核心价值观直接延续的可能性，中国文化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即当代文化阶段。

学为万能的”的口号。在一年里，同时出现了两种对于中国现代社会具有深远影响的最重要的杂志，成立了科学社，还有人在当时最著名的杂志《东方杂志》上发文，鼓吹科学，提出“科学万能论”，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1915年是“民主”与“科学”在中国生根发芽的标志性年份，因此也是现代文化史的开端。这一连串的相关事件表明，民主自由、人人平等，以及科学观念及科学思想的输入不再是个别人的努力，而已经进入了通过有组织的群体的力量，来进行有系统的输入、宣传并普及的时代。如果说，中国近代文化是把民主与科学这一西方近代文化的核心价值观作为追求趋向的话，那么，民主与科学则是现代文化中明确的文化价值核心，是现代学人明确的奋斗目标。

我们既然把1915~1949年作为现代文化史的时间断限，那就必须说明这一时期与近代文化时期的不同。第一，从文化史的角度看，两个阶段最大的不同，即是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即清王朝灭亡，统治中国达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被彻底推翻，建立了中华民国，实现了政治制度的根本性变革。尽管从今天看，这种变革是不成功的、不彻底的——封建残余大量存在，复辟反复辟的斗争从未间断，然而有一点却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谁再想从根本上恢复封建帝制，已不可能；民主、自由、平等观点已为绝大多数人民所接受，并且成为一种具有类主流形态的价值观。这一政治制度上的巨大变化，必然带来文化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变化。

第二，在中国近代文化发展阶段，中国文化的近代化，主要是在西方列强的外压下实现的，即中国传统文化完整性的被破坏均来自外力的干预，皆因外来文化的输入所造成；而现代文化阶段则不同，除了上述现象仍存在外，中国文化自身崛起的异己力量，即中国人开始主动地肩负起破坏自身文化的使命了。如果说，近代文化的主体还自觉不自觉地做着抗拒西方文化入侵的行动，可是在现代文化阶段，现代文化的主体、知识分子的主流价值观则是以如何破坏中国传统文化而不是以排拒西方文化为第一要义。

第三，现代文化的选择方式也与近代文化阶段不同。比如涉及与西方文化的关系，其主要话题，不再是要不要向西方学习，而是应当怎么样去向西方学习、如何学习。中国必须走现代化道路，这是五四时期所发出来的时代最强音，具有普遍的共识性。总的来说，从现代文化发展进程来看，20世纪初年，中国现代文化的框架就已基本形成了。尤其是在20世纪的头30年，中国社会文化呈现空前繁荣的景象，出现了继中国历史上春秋战国

“百家争鸣”之后的又一次思想文化解放运动，胡适称之为“中国文艺复兴运动”，^①从而使中国现代文化在原有基础上又向纵深发展了一步，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二

中国现代文化阶段也是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不断深入、“西化”程度不断加深的阶段。我们也有理由称这一阶段为“欧化时代”或“西化时代”，即从五四时期到1937年全面抗日战争爆发这段时间，“西化”、“欧化”的时代特征非常明显。所谓“欧化”其实就是“西化”，不过“欧化”比“西化”更具有特指性、更具体化。在东方国家中，日本也曾有个“欧化时代”，即“鹿鸣馆时代”。1883年7月竣工的鹿鸣馆，是日本修建的第一座正规的洋楼，为日本涉外交际中心。1885年5月，鹿鸣馆举行首次大型舞会，通宵达旦，纵情狂欢。从这以后，什么晚会、舞会、妇女慈善义卖会层出不穷，高官显贵及其眷属成了鹿鸣馆的常客。1887年伊藤首相主办的化装舞会，参加者有400多人，成为当时报上的一大新闻。它集中反映了19世纪80年代整个日本的社会风貌和社会性格，是日本政府带头在国内大搞“欧化”、“洋化”运动的生动写照。纵观中国近现代，尽管还没有出现过像日本那样由政府推进的极具“欧化”象征的“欧化”事件，但是，近现代的中国也出现过我们称作“西化”的“欧化时代”。它是伴随着近代历次抗击西方列强侵略失败，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受到极大挫折，西方事物潮水般涌入的背景出现的。

中国民族自信的完全丧失，则是在义和团被八国联军镇压之后。义和团运动，是那些强烈感受到西方生产生活方式威胁的下层人民自发的反帝排外运动。尽管这场运动具有强烈的排外、仇外色彩，愚昧落后，封建迷信色彩严重，其组织方式、信奉的信念、行为方式以及仇外的举动，都毫不值得称道，但它是由民众内部聚集起来的巨大的民族能量。当这种民族能量被释放，人民的反抗力量被列强镇压之后，民族的自信心也就自然消耗殆尽了。对此，孙中山先生曾说：“庚子年的义和团，是中国人的最后自信思想和最后自信能力去同欧美的新文化相抵抗”，“所以经过义和团之后，中国人的

^① 姜义华主编《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中华书局，1993，第285页。

自信力便完全失去，崇拜外国的心理便一天高过一天”。“以后因为失败，又反过来信仰外国。在中国所用的无论什么东西，都是要仿效外国……因为信仰外国，所以把中国的旧东西都不要，事事都是仿效外国；只要听到说外国有的东西，我们便要去学，便要拿来实行。”“自义和团以后，一般中国人的思想，时时刻刻、件件东西总是要学外国。”^① 征诸历史也是如此，近代中国崇洋媚外心理的形成，主要也是始于 20 世纪初年。

国民心态在对外关系上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崇洋羨洋”、“崇洋媚外”，以用洋货、穿洋服、会洋语为时尚。这方面以现代的海上海最为突出。当时报刊刻画上海的时髦派时称：“再说男子不可少的东西：西装、大衣、西帽、革履、手杖外加花球一个，夹鼻眼睛（镜）一副，洋泾话几句，出外皮篷或轿车或黄包车一辆，还要到处演说。”^② 甚至于有人为模仿洋人，不惜采取“高鼻法”、“长身法”、“凸乳法”、“细腰法”来达到相似效果，闹出不少笑话。

此外，在思想文化方面，崇洋媚洋的风气也相当炽烈。那就是举凡一切学问，皆以西洋学说为据。先有“醉心欧化”思想，后有“全盘西化”主张。“醉心欧化”派“举一事，革一弊，至于风俗习惯之各不相侔者，靡不惟东西之学说是依”，^③ 较典型的“醉心欧化”派，当以《新世纪》派为标志。^④ 创刊于法国巴黎的《新世纪》周刊（1907 年 6 月），倡言“三纲革命”、“孔丘之革命”、“祖宗革命”，对封建旧文化进行猛烈的批判。他们不认为中国古代文化中有任何值得继承的“国粹”可言：“数千年老大帝国之国粹，犹数百年陈尸枯骨之骨髓”，虽欲保存，但其“臭味污秽，令人掩鼻作呕”。西方新文明既已发生，“中国过往的一切历史与文化尽成陈迹”，自然“当在淘汰之例”。《新世纪》派在思想言论方面，主张废除汉字，立即代之以拼音文字；否定一切传统习俗及纲常道德观念，认为中国传统习俗道德“其阻碍进化，有甚于洪水猛兽者”，^⑤ 对忠、孝、节、义、武、俭以及仪节、丧葬、婚配、服饰等传统风俗道德的各个方面一一加以否定和批判；

① 《三民主义十六讲》，《孙中山文集》（上），团结出版社，1997，第 192～193 页。

② 《时髦派》，1912 年 1 月 6 日《申报》。

③ 黄节：《“国粹学报”叙》，王忍之等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 2 卷上册，三联书店，1960，第 44 页。

④ 郑师渠：《晚清国粹派》，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第 36 页。

⑤ 王忍之等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 3 卷，三联书店，1962，第 198 页。

提倡欧风欧俗。晚清具有“醉心欧化”倾向的人士在反对并否定传统风俗习惯的同时，更倡议以欧风欧俗取而代之。这方面言论既出自维新派之口，也出自革命派之口，反映出近代社会变迁、移风易俗的基本动向。

到了20世纪30年代，崇洋媚外在思想层面表现得最极端者，是“全盘西化”论。在他们看来，中国的东西一切皆不好，西方的东西一切皆好，甚至西方最不好的东西也比中国最好的东西要好。此外，认为中国的方块字是“野蛮时代”的文字，是落后于时代的象征，而西方的字母文字“先进”、“文明”，主张废除中国的汉字代之以拼音文字的“汉字罗马化运动”，也可以看成“崇洋”的极端表现。

从总的趋向来看，20世纪初年的现代先进的知识分子无不把近代欧美文明作为一种理想状态看待，并将其作为改造中国社会的范本，主张中国走“西化”或称“现代化”的道路。其中以胡适和梁漱溟两人的看法最为典型，一个是“理性”激进，一个是“情志”保守，他们两个人主张的共同的地方，就大致代表了那个时代文化价值选择的基本倾向。

胡适是西化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认为西方文化是人类的正途，是建立在“求人生幸福”的基础上的。西方文化“确实增进了不少的物质上的享受，然而他也确然很能满足人类的精神上的要求，努力建设‘人的乐园’‘人世的天堂’；丢开了那自称的个人灵魂的超拔，尽量用人的新想象力和新智力去推行那充分社会化了的新宗教与新道德，努力谋人类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在他看来，西洋近代文明，是一个常态的文明，是一种“利用厚生”的文明。它建立在三个基本观念之上：“第一，人生的目的是求幸福。第二，所以贫穷是一桩罪恶。第三，所以衰病是一桩罪恶。”“因为贫穷是一桩罪恶，所以要开发富源，奖励生产，改良制造，扩张商业；因为衰病是一桩罪恶，所以要研究医药，提倡卫生，讲求体育，防止传染的疾病，改善人种的遗传；因为，人生的目的是求幸福，所以要经营安适的起居，便利的交通，洁净的城市，优美的艺术，安全的社会，清明的政治。纵观西洋近代的一切工艺，科学，法制，固然其中也不少杀人的利器与侵略掠夺的制度，我们终不能不承认那利用厚生的基本精神。”^①对近代欧美文明持肯定态度。

梁漱溟指出：“无论是什么幸福说、快乐说、为我说、利人说，总都是一路气味。”欧洲大陆也是如此，“所以西洋思想竟不妨以功利主义将他代

① 胡适：《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东方杂志》第23卷第17号，1926年。

表了。最近的什么实际主义、人本主义、工具主义、实验主义，总是讲实际应用的，意思都差不多”。机器的发明所导致的人的异化，使为消费而生产的合理的生活变成了为生产而生产的不合理的生活。所以他说，“机械实在是今世界的恶魔”；西方如此的经济，其戕贼人性“是人所不能堪”的。人们之间已没有温情。其生活的不自然、机械、枯燥乏味都是一样。特别是机器对于人的异化，使从前的“人用机械”变成了现在的“机械用人”。

梁漱溟尽管批评西方文明的功利主义倾向，但他也高度礼赞西方文明，对于此方面，学术界却不大给予论述和宣传。梁漱溟肯定了西方文明的“人的个性伸展”和“人的社会性发达”。他强调指出：“个性伸展社会性发达”这八个字就可以概括西方化的全部，这样新异的色彩，就是“德谟克拉西”（democracy），因此，“自由”、“平等”、“德谟克拉西”，“是从此才得到的”。这也是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立宪共和得以确立的基础。立宪共和，就是人的个性伸展至社会性发达。人人自己做主，自然是个性伸展了，不仅要自己出头做主，还要组织国家，“共谋往前过活才行”。

他还高度礼赞西方的科学文化，认为“塞恩斯”、“德谟克拉西”为西方两大最耀眼的“异采的文化”。他说：“以我们东方人看西方东西，那异点便刺目而来，原是容易知道的。譬如最初惹人注目的枪炮、铁甲舰、望远镜、显微镜、轮船、火车、电报、电话、电灯，同后来的无线电、飞行机以及洋货输入后的日常起居服御的东西，与我们本土的走内河还要翻的民船，一天走上数十里的骡车，以及油灯、蜡烛等一切旧日东西比较真是异样的很！”^①在梁漱溟看来，征服自然的态度、科学与科学的精神、西方化的德谟克拉西精神最为显著，也最值得称道。“西方化的科学色采”，就是样样东西都带着征服自然的威风，为我们所不及。举凡一切物质方面的事物，无不如此。其德谟克拉西精神，即民主精神，主要表现为人人平等，人人当家做主，“这大的国家竟可没有皇帝，竟可不要皇帝”。西方人全没有尊卑上下之分，人人权利平等。他们在政治上所谓的共和、立宪都是这种体制，这与中国人习惯的独裁、专制是完全不同的。

这样看来，梁漱溟除了主张用中国的儒家思想补西方文明过于物质化的不足之外，他并没有全盘否定西方文化之意，而且也不拒绝中国走“西方化”的道路。因此，我们把胡适和梁漱溟作为现代知识分子的代表，抽取

^①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32～33页。

他们文化选择观中具有共性的成分，就可以看到：现代知识分子思想的主流，没有极端排斥近代欧美文化的。他们都肯定西方的民主和科学，都主张走西方宪政民主的道路，主张伸张人的个性，追求“社会性的发达”。这就是中国“欧化时代”最核心的文化价值观。

思想观念层面的多元化趋势也是“欧化时代”的特征。20世纪初年，随着中西文化交流的扩大，留学生和新式学堂学生大量增加，国外思潮以他们为中介大量地涌入国内。许多国外的新思想和新思潮被生吞活剥地捆绑而至，一时间在中国大地上出现了思想的“百花园”景观，主要思想学说有马克思主义学说、无政府主义思潮、新村主义、西方实用主义、易卜生主义，等等。除上述新思潮、新流派外，在20世纪初年流行的思潮还有工读主义思潮、自由主义思潮、基尔特社会主义思潮、“联省自治”思潮、尊孔复古思潮、科学主义思潮、职教思潮、整理国故运动思潮，还有基督教中国化本色化思潮，以及尼采哲学、康德哲学、罗素哲学、柏格森哲学的传入，等等。从总体上看，20世纪头30年在社会上或知识界兴起的新思潮，犹如百货店橱窗里陈列的商品，琳琅满目，令人目不暇接，构成了这一时期文化多元化的壮丽景观。

社会生活层面也出现了“洋化”、“欧化”趋势。以西货为例，西方商品大范围占领中国市场，“洋”字头的商品，大行其道。以洋货为核心的西方器物的扩张程度，甚至于连居于穷乡僻壤的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也受到冲击。例如，在云南昭通偏僻的山区，商店里竟陈列着不少洋货，从各种哈刺呢、哗叽、羽纱、法兰绒到钟表、玻璃等，一应俱全，甚至纽扣也是伯明翰的产品，这些洋货的售价“却并非贵得惊人”。^①西方商品的输入打开了千家万户的门户，让普通之家也与世界发生了密切的联系。关于西洋器物的种类，郑观应在《盛世危言》所介绍的带“洋”字的西货有近70个品种，还只是个列举。郑观应作为近代人，对西洋器物如数家珍地列举，说明这些器物早已融入社会生活，成为其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了。此外，作为西方的器物文化被输入中国的还有铁路、火车、军舰和大炮、轮船、汽车、飞机、电报和电话等，西式文化设施如报纸、邮政、学校、教育、图书馆等。

蒋梦麟在《西潮》一书中，谈到西方文明的影响时说：“只要这些村镇不接触现代文明，中国就可以一直原封不动，如果中国能在通商口岸四周筑

^① 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中华书局，1962，第1106页。

起高墙，中国也可能再经几百年而一成不变。但是西洋潮流却不肯限于几个通商口岸里。这潮流先冲激着附近的地区，然后循着河道和公路向外伸展。五个商埠附近的，以及交通线附近的村镇首先被冲倒。现代文明像是移植过来的树木，很快地就在肥沃的中国土壤上发芽滋长，在短短五十年之内就深入中国内地了。”^①

他强调传教士是西方商品的传播者：“基督教传教士曾在无意中把外国货品介绍到中国内地。传教士们不顾艰难险阻，瘴疠瘟疫，甚至生命危险，遍历穷乡僻壤，去拯救不相信上帝的中国人的灵魂。他们足迹所至，随身携带的煤油、洋布、钟表、肥皂等等也就到了内地。一般老百姓似乎对这些东西比对福音更感兴趣。这些舶来品开拓了中国老百姓的眼界，同时也激起了国人对物质文明的向往。传教士原来的目的是传布耶稣基督的福音，结果却无意中为洋货开拓了市场。”^②

他在谈到西化的进程时这样写道：“这个转变首由外国品的输入启其端，继由西方思想和兵舰的入侵加速其进程；终将由现代的科学、发明和工业化，完毕其全程。”“虽然新旧之争仍在方兴未艾，立宪与革命孰长孰短亦无定论，中国这时已经无可置疑地踏上西化之路了。”^③

蒋梦麟谈到了他在美留学九年后回国时上海的变化：“回到上海时还是夏天。离开九年，上海已经变了。许多街道比以前宽阔，也比以前平坦。租界范围之外也已经铺筑了许多新路。百货公司、高等旅馆、屋顶花园、游乐场、跳舞场都比以前多了好几倍。上海已经追上纽约的风气了……年轻女孩子已剪短头发，而且穿起高齐膝盖的短裙，哦！……到处都可以看到穿着高跟鞋的青年妇女。当你听到人行道上高跟皮鞋的急骤的笃笃声时，你就知道年轻的一代与她们的母亲已经大不相同了。过去的羞怯之态已不复存在。也许是穿着新式鞋子的结果，她们的身体发育也比以前健美了。从前女人是缠足的。天足运动是中国改革运动的一部分，开始于日俄战争前后，但是在辛亥革命成功以前进展始终很慢。我想高跟鞋可能是促使天足运动迅速成功的原因，因为女人们看到别人穿起高跟鞋婀娜多姿，自然就不愿意再把她们女儿的足硬挤进到绣花鞋里了。”^④

① 蒋梦麟：《西潮》，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第6页。

② 蒋梦麟：《西潮》，第30~31页。

③ 蒋梦麟：《西潮》，第15、53页。

④ 蒋梦麟：《西潮》，第87页。

在蒋梦麟看来，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传播，确实造就了中国的“欧化时代”，他在抗日战争时期谈到中国现代文化时曾这样描述这一变迁：在衣着方面，过去30年间西化的趋势最为显著，呢帽和草帽已经取代旧式的帽子和头巾；昔日电影里所看到的辫子已失了踪迹；女人们都已烫了头发，短裙、丝袜和尼龙袜已使中国妇女有机会显示她们的玉腿；女人的足更已经历一次重大的革命，西式鞋子使她们放弃了几千年来的缠足恶习，结果使她们的健康大为改善；健康的母亲生育健康的子女，天足运动对于下一代的影响至为明显；现代的儿童不但比从前的儿童健康，而且远较活泼，不但行动比较迅速，心智也远较敏锐。

在社交方面，男女可以自由交际，与过去男女授受不亲的传统观念适成强烈的对照。民法中规定，婚姻不必再由父母安排；青年男女成年以后，有权自行选择对象。男女同校已经成为通例，男女分校反倒成了例外。

在住的方面，一向左右屋基选择的风水迷信已经渐为现代的建筑理论所代替。在若干实例中，古代的艺术风格固然因其华丽或雄伟保留了下来，但是大家首先考虑的还是阳光、空气、便利、舒适、卫生等要件。现代房屋已经装置抽水马桶、洋瓷浴盆和暖气设备。硬背椅子和硬板床已经渐为沙发及弹簧床垫所取代。中国菜肴花样繁多，因为我们随时愿意吸收外国成分。“到目前为止，中国已经从西化运动中获得很多好处。妇女与男子享有同等的社会地位，享受结婚和再嫁的自由，并且解放缠足，这就是受到西方尊重妇女而来的。西方的医药也已阻遏了猖獗的时疫，麻醉药的应用已使千万病人在施行手术时免除痛苦。机器和发明已经改凌晨了生活技术，对于人民的生活提供了重大贡献……现代科学已经拓宽了知识范围；中国的历史、哲学和文学的研究工作已采用了科学方法。大家一向信守不疑的迷信，也因科学真理的启示而渐渐失势。我们吸收西方思想的能力愈强，我国的文化亦将愈见丰富。”^①

总之，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欧化特征表现在思想观念、衣、食、住、行各个方面。在思想观念方面，以崇洋习洋为文化主要趋向。在衣的方面，主要是西式服装的大量流行。在食的方面，则是西餐的流行，如面包、西式糕点、西式饮料等。与西餐相关的行为方式、制作工艺、相关理念也被引进。如西餐讲究营养，讲究卫生，讲分餐制，使用刀叉，这都与中餐有很多差

^① 蒋梦麟：《西潮》，第226～227页。